

马克思 恩格斯
经济学创建纪略



河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 经济学创建纪略

李善明 主编

周成启 杨国昌 王福民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创建纪略

李善明 主编

周成启 杨国昌 王福民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22.625印张 3插页 542,000字 印数：1—6,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86·153 定价：2.75元

前 言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研究这一科学的创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推进基础理论的研究；它可以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理论原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它可以增强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纯洁性；等等。总之，开展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创建纪略》，就是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概括地记叙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情况，阐释他们所撰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大量摘录、笔记、手稿、书信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对于这些论著，《纪略》均就它们的主要内容、特点，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论述和说明。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纪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部编年史。

《纪略》与一般的“年表”不同。它不是记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等在内的整个生平活动，而只是记述他们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活动；它也不是只简单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种种活动，而是除了较详细地揭示这些活动的过程和情况

之外，还概略地对其中所涉及的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进行分析，并介绍其内容、说明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也可以说是一部资料性、知识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工具书。

《纪略》尽量采用新材料和新成果。对于近年来新发现和新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等，我们都尽量予以录用，凡能找到的中外文资料也都尽量予以反映。

《纪略》全稿按三个时期，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至六十年代和七十至九十年代划分为三个大的部分。每一部分的开头有一“概述”，简要说明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情况。每一年的开头又有一个很简单的“提要”，以指明该年之内的主要内容或主要活动。

《纪略》以时间为题列出条目。这些条目均统一按时间顺序汇合编排。

凡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等，均在时间条目下再列出一个用黑体字排印的文字标题进行强调，以提醒读者重视。

《纪略》由四川大学经济学系李善明同志主编。参加编著工作的还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周成启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杨国昌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福民同志。

《纪略》曾于1978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政治经济学年表》为名，分上、下两册，由贵阳师范学院铅印、贵州财经学会翻印，在全国各有关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图书馆以及学术界朋友中进行交流，征求意见。此次正式出版，除进一步核实订正材料，修饰润色文字外，还删去了原稿中一些与政治

经济学关系不大的材料，增补了一部分新资料和“概述”、“提要”，并新加了“名目索引”、“参考文献目录”作为附录。

《纪略》的修改工作曾得到许多前辈、同行和学术界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们或者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或者提供了一些资料线索，甚至直接贡献了自己整理的参考材料。这些同志是：陈岱孙、陶大镛、胡代光、赵洪、商德文、马健行、田光、李成勋、王锡君、张钟朴、张赞洞等。在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特表示深切谢忱。

《纪略》缺点、错误可能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2年12月于成都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概述.....	(3)
一八四一年.....	(7)
一八四二年.....	(8)
一八四三年.....	(11)
一八四四年.....	(19)
一八四五年.....	(26)
一八四六年.....	(39)
一八四七年.....	(46)
一八四八年.....	(59)
一八四九年.....	(66)

第 二 部 分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

概述.....	(73)
一八五〇年.....	(78)
一八五一年.....	(83)
一八五二年.....	(102)

一八五三年	(106)
一八五四年	(114)
一八五五年	(115)
一八五六年	(118)
一八五七年	(121)
一八五八年	(132)
一八五九年	(145)
一八六〇年	(166)
一八六一年	(170)
一八六二年	(179)
一八六三年	(194)
一八六四年	(204)
一八六五年	(207)
一八六六年	(217)
一八六七年	(227)
一八六八年	(278)
一八六九年	(328)
一八七〇年	(345)
一八七一年	(354)

第三部分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

概述	(363)
一八七二年	(366)
一八七三年	(383)
一八七四年	(393)

一八七五年·····	(396)
一八七六年·····	(406)
一八七七年·····	(415)
一八七八年·····	(428)
一八七九年·····	(435)
一八八〇年·····	(442)
一八八一年·····	(449)
一八八二年·····	(463)
一八八三年·····	(480)
一八八四年·····	(501)
一八八五年·····	(540)
一八八六年·····	(561)
一八八七年·····	(578)
一八八八年·····	(587)
一八八九年·····	(596)
一八九〇年·····	(604)
一八九一年·····	(614)
一八九二年·····	(637)
一八九三年·····	(655)
一八九四年·····	(668)
一八九五年·····	(685)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698)
主要名目索引·····	(703)

第 一 部 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概 述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也已经形成、确立或产生。

所谓形成、确立或产生，就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或经济理论，已经越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并以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崭新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或经济学说已经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了本质的区别，已经对它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附庸，而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确立或产生，其主要标志是：(1)提供了研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本原理；(2)确立了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象；(3)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4)奠定了科学剩余价值论的基础；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已经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四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又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运用上述基本原理直接地研究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关系和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而进一步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以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等等，这一时期都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和阐述。

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直接的具体的重要方法，如科学的抽象分析的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等等，都是到后来才加以制定和运用的；但应强调指出，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制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直接体现，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领域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特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式。所以，这一时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直接地为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本原理。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也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可以说，从他们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日起，就把这门科学同私有制关系，进而同社会经济关系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明显的应当提到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直接地把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范畴看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或其抽象^①。这无疑是把社会生产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

① 参阅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要在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①，从而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经济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本身。所以，无论是《哲学的贫困》，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们都是把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直接作为考察或研究对象的。

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虽然四十年代初期，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等著作中，曾经否认过它的存在和现实意义，但他们从共同合作的《神圣家族》开始，就已经逐步向这一科学理论过渡，而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一过渡就已经基本完成。特别是到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完全过渡到了劳动价值论，并且越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发展，提出了与之具有本质区别的新思想，新观点。例如关于价值的性质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包括价值范畴在内的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从而揭示了价值范畴的社会历史性质。与价值性质相联系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问题，马克思则早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已初步揭示了它们的一些要点，而在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摘录笔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价值实体和价值量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有了新的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解决了价值规律在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4页。

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形式问题，从而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开始把劳动价值论安放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关于剩余价值论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已开始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剩余价值的起源，从而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力”商品和“资本”两个问题上。关于“劳动力”商品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特别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不仅已经知道了雇佣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而且已经在事实上着手区分“劳动”与“劳动力”。《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所讲的“劳动”，实际上是“劳动力”，所以后来恩格斯在1891年再版此书时就干脆把“劳动”一词改为“劳动力”一词。在实际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揭示了工资的本质。关于“资本”问题，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已经把资本的阶级实质极为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明确地指出它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在这一著作中，特别是在与它紧密相联的遗稿《工资》中，马克思已经在事实上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甚至已经对“资本有机构成”及其运动规律有所认识，虽然他这时还没有使用这些名词或术语。这样一来，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关于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也逐渐地接近于了解和揭示出它们的实质。

当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相距很远，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上也还存在着某种错误观点，这同样是无庸置疑的。

一八四一年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及其变化。博士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研究费尔巴哈新著《基督教的本质》。

【1838年7月中—1841年3月下半月】

恩格斯在不来梅一家大贸易公司见习经商。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文学，对“青年德意志”的作家非常感兴趣；他为《德意志电讯》杂志写了《乌培河谷来信》一文，并在文艺批评杂志上发表了許多书评和随笔。

恩格斯钻研黑格尔的哲学，阅读批判宗教的著作，其中包括青年黑格尔分子大·弗·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

在这个时期，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已经形成。

【1839年初—1841年3月】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期间即研究希腊哲学，特别是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并且撰写《**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一文作为博士论文。

这时马克思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4月】

6日马克思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并于15日从耶拿大学得到博士证书。

【约7月间】

马克思研究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

【1841年9月下半月—1842年10月8日】

恩格斯参加志愿兵在柏林服役。服役期间，恩格斯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这时他和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兄弟、弗·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恩格斯还在《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等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谢林的反动观点。

【1841年下半年】

恩格斯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

一八四二年

马克思、恩格斯与《莱茵报》，及其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第一次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马克思开始研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开始研究英国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3月】

恩格斯开始为反政府的莱茵省资产阶级的报纸《莱茵报》撰稿，一年内给该报写了许多政论性文章。

【约4月初—5月底】

马克思在1841年底曾计划写作关于宗教和艺术的著作。为此他在波恩阅读和研究有关宗教史和艺术史的著作，先后写下七册摘录笔记，一般称《波恩笔记》。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第三册笔记关于德布罗斯《论物神崇拜》一书的摘录中，曾包含了对“拜物教”概念的详细摘录。他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分析商品性质时，曾使用了这一概念。